

# 王恢、韩安国之辩的辩论智慧探析

余英杰

西北民族大学, 中国·甘肃 兰州 730030

**【摘要】**王恢与韩安国同为西汉大臣, 两者就对匈和战一事展开辩论, 此次辩论是汉廷政策转变的标志性事件。两者均引经据典, 围绕白登之围、和亲政策展开辩论。韩安国主和, 倾向于稳健保守, 王恢主战则偏向于锐意求变。因王恢的主张切合汉武帝建功立业的需求, 且具备实施条件, 辩论结果以王恢获胜告终。此场辩论蕴含着人心人性, 司马迁、班固均收录了此次辩论, 为后世研究韩安国与王恢二人的辩论智慧留下了宝贵材料。

**【关键词】**王恢; 韩安国; 辩论; 智慧; 探析

## 1 辩论背景

汉朝统治者在面临重大决策时, 会召集群臣议事。在议事时, 臣下被赋予就题展开讨论的机会, 但讨论的议题由皇帝拟定, 最终决策权亦归于皇帝, 臣下所拥有的议政空间始终局限于皇权政体的基本框架之内, 辩论结果受皇帝个人喜恶、性格影响颇深。王恢与韩安国辩论时, 必须符合道德的标准才能感化人心, 赢得统治者的青睐, 最终取得辩论的胜利。

辩论前, 汉兴七十余年, 由于长期无大规模战事, 加之国家采取休养生息政策, 社会财富得到空前积累。即便偶遇水旱之灾, 百姓仍能维持基本自给, 城乡仓储充实, 国库积蓄丰厚。京师所藏铜钱累积至巨万, 以至于贯穿钱绳朽坏而不可计数; 太仓之粟积攒数年, 溢出仓外, 部分粮食腐烂不可食。民间街巷、田野马匹成群, 以致乘坐年轻母马者被视为贫贱。守门小吏也可食肉, 官吏因久居其位而子孙长大, 甚至以官名为姓氏。在此背景下, 民众普遍自爱畏法, 崇尚礼义, 以犯法为耻。然而, 司马迁敏锐指出, 物极必反: 财富集中导致豪强兼并、骄纵奢侈, 宗室与公卿大夫竞相逾越礼制, 在宅第、车马、服饰上僭越无度。及至武帝前期, 王恢设马邑之谋, 却以失败告终, 匈奴断绝和亲, 侵扰北境。长期战事使民众苦于徭役, 财政耗竭, 百姓疲敝, 便想方设法巧避法令。财力不支, 朝廷遂开“入物补官、出货免罪”之例, 导致选官制度败坏, 廉耻观念崩塌, 武力进用, 法令日趋严密。正是在这种财政危机与国家干预下, 专事聚敛的兴利之臣应运而生。匈奴侵盗不已的现实威胁, 与上述强盛的国力形成矛盾, 构成了廷辩爆发的直接原因。当匈奴来请和亲时, 主战与主

合便成为两者争论的焦点。

## 2 韩安国以圣为名的反战论证

韩安国在辩论前便已名声渐显, 七国之乱中, 坚守住了梁国国都睢阳。此外, 窦太后的小儿子梁王受宠非常, 不仅有权推举梁国国相和二千石级官员人选, 还有拱卫京师、平定叛乱的功劳。但他恃宠而骄, 修建的宫殿堪比皇宫, 积累了数不胜数的财富。不由得引起了汉景帝的不满, 韩安国则从长公主刘嫖入手, 哭诉了梁王平定七国之乱的功劳以及母子之情, 晓之以情动之以理。长公主转述给窦太后, 窦太后再转述汉景帝, 这才消除了兄弟、母子之间的隔阂。上述二事, 可见韩安国的胆略与声情并茂的辩论方式。

韩安国主张“勿击”的论辩策略是以史为鉴的保守做法, 开篇就援引汉高祖白登之围的教训: “臣闻高皇帝尝围于平城, 匈奴至者投鞍高如城者数所。平城之饥, 七日不食, 天下歌之, 及解围反位, 而无忿怒之心。”委婉提醒汉武帝, 同时警示主战派。随后韩安国重新诠释了和亲政策, 将高祖派遣公主和亲的决策提升到“圣人以天下为度”的高度, 强调“不以己私怒伤天下之功”。这种论述将政治决策道德化, 使得主战立场在道德层面陷入被动。称和亲政策“至今为五世利”, 则是借助祖宗成法的权威性来增强自己立场的合法性。

韩安国借此奠定了他的辩论基调, 宣传对匈奴用兵风险极高, 并标榜“圣人”典范与“和亲”传统的合理性, 直言“夫圣人以天下为度者也, 不以己私怒伤天下之功, 故乃遣刘敬奉金千斤, 以结和亲, 至今为五世利。”表明和亲政策长期存在的优势, 彼时“遣刘敬奉金千斤, 以结和

亲”指高祖采纳娄敬（刘敬）之策，彼时娄敬建议高祖将公主嫁与匈奴单于，厚赠财物，使所生之子继位为单于，利用血缘牵制，可不战而臣匈奴。娄敬又言关中人少，近胡而东有六国强族，宜徙齐、楚等诸侯后裔及豪杰充实关中，以强本弱末。高祖从之，徙十余万口。

他将高帝的和亲塑造成“以天下为度”的“圣人”之行，将“主战”等同于泄“私怒”，在道德与政治正确性上抢占制先机。随后，韩安国便分析匈奴战术特性与军事风险，他指出匈奴是“轻疾悍亟之兵也，至如猋风，去如收电”，强调匈奴“居处无常，难得而制”的特点，这种机动灵活的作战方式给以步兵为主的汉军带来巨大挑战。此处描述与《史记》“其长兵则弓矢，短兵则刀铤。利则进，不利则退，不羞遁走”的记载吻合，结合上文韩安国对白登之围、娄敬和亲之议的描述，可见他常以引经据典作为论证手段。他最为有力的论述在于对战争后果的预判，警告说，如果发动战争，将导致“边郡久废耕织”的局面，如果轻装急进，则难以取得战果，行军时容易被侧翼威胁、中途截断；行动过快则粮草不继，行动过慢则会延误战机，行军不到千里，人马便会断绝粮草。这种基于民生考量的论述，既体现出政治家的责任感，使韩安国占据道德高地。

韩安国的论述层层递进，其立论之基深深植根于历史教训与现实主义考量，援引“白登之围”的历史创伤以增强帝王的恐惧感，利用古代“孝”道思想鼓励当朝皇帝延续前朝和亲之举。同时，指出在草原与匈奴决战，汉军处于结构性劣势，长期战争会导致经济秩序失衡，将战略风险具象化为民生灾难，以此进行最后的道德与情感劝谏，不可不谓不精明。

### 3 王恢变古雪耻的主战论证

王恢为西汉燕地（今河北北部）人，是汉武帝时期位列九卿之一的大行令，主管边疆事务。他出身边吏，因长期在边境为官而“习知胡事”，了解匈奴的情况。除马邑之围外，在与韩安国辩论前，他为人所知的功绩是成功处理了闽越危机。汉武帝建元六年（公元前135年），闽越王郢出兵攻打南越，南越向汉廷求救。王恢与韩安国一同被委以重任，由王恢率军出豫章。汉军兵锋未至，闽越内部发生政变，其王弟余善联合众臣杀死闽越王郢，并将首级献给王恢求和。王恢审时度势，接受了这次投降并就此罢

兵，使汉朝未经大战便平息了此次乱局。

王恢的论辩态度是求变，面对韩安国基于历史经验的稳健立场，他首先提出“变易”观，解构“和亲”的合法性。为从理论上挑战韩安国的立论基础，王恢提出“五帝不相袭礼，三王不相复乐”的观点，主张变革。此语出自《礼记·乐记》“五帝殊时，不相沿乐，三王异世，不相袭礼”的记载，是儒家经典中关于制度变革的权威论述。王恢引经据典，为其“变古”主张提供理论依据。

他对历史的重新解读尤为精彩，并不否认韩安国所举的史实，而是赋予这些史实全新的解释。关于高祖的白登之围，他认为“所以不报平城之怨者，非力不能，所以休天下之心也。”这一解读将高祖的和亲政策从屈辱妥协重新定义为暂时忍耐，为当下的政策转变扫清了道德障碍。

在具体的战略分析上，王恢敏锐地抓住时代变化这一关键因素。他强调当时国家强盛已有“万倍之资”，与汉初的国力不可同日而语，此时开战犹如“以强弩射且溃之痛”，生动表达了对双方力量对比的判断，也展现出必胜的信心。为进一步降低汉武帝的道德压力，他通过描绘描绘边境士卒伤亡，中原地区运送灵柩的丧车接连相望的惨状，他将主战从战略选择提升到道德义务的高度，巧妙地化解了韩安国的道德攻势，而“雪累世之耻”的提法，更是精准地触动了汉武帝建立不朽功业的雄心。王恢的论述旨在解构韩安国的历史叙事，并构建新的行动逻辑。

他直接挑战韩安国“祖宗成法不可变”的立论根基，认为政策应各因世宜。将白登之围释为耻辱，主战之举实为雪耻之举。他将高帝的和亲解释为主动的、充满智慧的战略忍耐，而非永久的屈服。这既维护了高祖尊严，又将和亲政策定义为无奈妥协之举，从而为当下的主战扫清道德障碍。

此外，王恢还借用韩安国对匈奴的军事特征分析，并反转譬喻，重塑敌我力量认知。以“强弩”喻此时汉廷的军事实力，是对韩安国潜在担忧（劳师远征，强弩之末）的话语反转。他将匈奴比作“且溃之痛”，将汉军力量比作足以清除毒疮的“强弩”，扭转了力量对比的叙事，从“难以战胜”变为“一击即溃”。

纵观这场廷议，“雪累世之耻”是王恢辩论的核心煽动点。他将数代人的和亲政策重新定义为“累世之耻”，将一次军事行动升华到为民族和国家雪耻的道德高度，极

大地迎合了汉武帝建立不世之功的心理。诉诸“国耻”叙事，激发帝王实现春秋一统的鸿愿。

就汉武帝个人意志而言，《史记》与《汉书》中的武帝形象都呈现出强势的一面。《史记·太史公自序》言汉武帝“汉兴五世，隆在建元，外攘夷狄，内修法度”，将“外攘”视为建功立业之举，与内修法度并列，表明此举或有安稳朝廷之意。此处夷狄之提法，无种族歧视之意，更多的是彰显汉武帝的雄心壮志。而《汉书·武帝纪》评论道：“如武帝之雄材大略，不改文景之恭俭以济斯民，虽《诗》《书》所称，何有加焉！”即使对汉武帝多有批判的司马迁，也认为武帝有宏图大略。可见，强势的性格使汉武帝天然倾向于王恢所描绘的宏伟蓝图。

此外，武帝拥有“一雪前耻”的资本。王恢的主战倾向在朝中已有武安侯田蚡等支持者，加之王恢对少数民族事务较为熟悉，更能取得皇帝信任，而时任丞相的田蚡是支持王恢的。此时，汉廷的骑兵已有发展，骡、驼、驴等牲畜的使用增强了战时的运力，军队得到扩充，户数与仓廩充实，具备物质基础。

这场辩论也可视为韩安国、王恢两人保守与冒险的态度之争，王恢立足于对现实利益的敏锐审度，洞悉到和亲政策无法约束匈奴反复背约这一结构性的失效，因而主张抓住战机，以主动的军事打击重塑边境的长期安定。与之相对，韩安国的智慧则体现为对代价与风险的冷静评估，他以“强弩之极，矢不能穿鲁缟”的传神譬喻，深刻揭示了远征作战必然伴随的力量衰减与不可控风险。前者重在把握战略机遇，后者重在规避系统危机，这场辩论实际上是进取之心与持重之虑之间的博弈。

#### 4 余论

王恢与韩安国的辩论，是两种有历史与理论支撑的战略路径的对抗。韩安国立足于历史教训和现实困境，其论据坚实；王恢则着眼于时代变化和力量转化，其诉求激进。汉武帝采纳王恢之议，是个人雄心、国力基础与战略转型需求在历史节点上的契合。尽管马邑之谋战术失败，但它标志着汉帝国对匈政策的转折，其影响远超越了一场战役的得失。司马迁、班固等史家通过翔实记录双方的言论与事件的结局，引导读者思考历史决策中理性计算与意志

冲动的取舍，封建社会重大决策受统治者个人好恶影响较深，历史事件属于人事，便离不开人心的算计。

#### 参考文献：

- [1] (西汉)司马迁.《史记》卷30《平准书》[M].北京:中华书局,1959年,第1420-1421页.
- [2] (西汉)司马迁.《史记》卷58《梁孝王世家》[M].北京:中华书局,1959年,第2081-2092页.
- [3] (西汉)司马迁.《史记》卷99《刘敬叔孙通列传》[M].北京:中华书局,1959年,第2719页.
- [4] (西汉)司马迁.《史记》卷108《韩长孺列传》[M].北京:中华书局,1959年,第2860-2863页.
- [5] (西汉)司马迁.《史记》卷110《匈奴列传》[M].北京:中华书局,1959年,第2879页.
- [6] (西汉)司马迁.《史记》卷130《太史公自序》[M].北京:中华书局,1959年,第3303页.
- [7] (东汉)班固.《汉书》卷52《窦田灌韩列传》[M].北京:中华书局,1962年,第2399-2407页.
- [8] (东汉)班固.《汉书》卷95《西南夷两粤朝鲜传》[M].北京:中华书局,1962年,第3860-3861页.
- [7] (元)陈澧注,金晓东校点.《礼记》卷7《乐记》[M].上海:上海古籍出版社,2016年,第432页.
- [10] 孙磊.“大一统”与以中华文明为中心的政治合法性理论构建[J].孔子研究,2024(4):61-62.
- [11] 孙磊.<春秋>“大一统”与国家秩序建构——以西汉国家治理为中心[J].东南学术,2022(6):170-173.
- [12] 王兴锋.汉代王恢的民族关系思想——兼谈马邑之战的谋划与实施[J].中国区域文化研究,2021(1):79-86.
- [13] 霍艳艳.韩安国与王恢的廷议争辩[D].内蒙古大学,2013.
- [14] 何平安.从司马迁笔下的汉武帝看<史记>的讽刺艺术[J].青海师专学报,1984(2):77-81.

#### 作者简介：

余英杰(2003.1—),男,汉族,河南辉县人,西北民族大学历史文化学院,24级在读研究生,硕士学位,专业:历史学,研究方向:中国古代史。